



“小师政委”方永乐

智破王庄

1934年10月,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,方永乐受中共鄂豫皖省委委派,率领鄂东北独立团600余名指战员,千里转战,来到皖西,与高敬亭重组红二十八军,任红八十二师政委,扛起了坚守大别山的重任。

1935年2月初红二十八军第三次组建时,全军只有1300余人,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、军属交通队;八十二师也只有一个二四四团和特务营。红二十八军不设军长,只设军政委,由高敬亭担任,方永乐被任命为红八十二师政委。就这样,年仅19周岁的方永乐成为红二十八军的“二把手”。

2月12日,红二十八军行至霍山县的白果地时,得到消息:国民党安徽省省府委员余谊密,以为红军早已被国民党“剿灭”,于是带了其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儿子和200多人的卫队,从安庆回到老家王庄过年。

余谊密父子极为反动,双手沾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鲜血,曾指挥地主武装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200余人。为了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报仇雪恨,高敬亭和方永乐决定攻打王庄,消灭余谊密父子。鉴于王庄内碉堡林立,附近又有敌人的驻军可以随时支援,为了快速解决战斗,高敬亭和方永乐经过充分研究商议,制定出一个“智取”方案。

2月13日傍晚,方永乐冒雪带领手枪团和特务营悄悄来到王庄附近,秘密埋伏在后山山顶。2月14日中午,手枪团勇士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的“团长”“副官”“马弁”,携带着大件礼物,骑着高头大马,大模大样地进入王庄。在经过岗哨时,“团长”告诉团丁自己是余谊密的老同学,今天恰逢带着部队路过此地,得知余谊密在家,于是特来“拜年”“叙旧”。

一行顺利闯过了哨卡,进入余谊密家中。只见院内厢房里余谊密的卫队正在打麻将、推牌九。正房门口只站着一个勤务兵。“团长”高声说:“谊密兄在吗?”勤务兵见来者穿着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制服,毫不怀疑,连忙挑开门帘让一行人进入正房。

4名红军战士互相使了个眼色后,一人站在门口和勤务兵聊天,两个人转身走向厢房。扮成“团长”的红军战士不等余谊密出来迎接,便大步进入正房,然后高声说:“恭喜,谊密兄,新春发财!”

余谊密和其次子正在房中,却根本想不起来对方是谁,只得起身赔笑说:“请坐,请坐。”

见时机已到,进屋的红军战士立即拔出手枪,对准了余谊密父子。与此同时,门口的红军战士也拔枪对准了勤务兵。勤务兵企图顽抗,被一枪击毙。厢房里的卫队听到枪声,慌忙向外张望。早已守在门口的两名红军战士迅速掏出手榴弹扔进屋内。随着两声巨响,里面的敌人被尽数“报销”。随后,4名红军战士押着余谊密父子迅速向庄外撤退。庄口哨卡里的团丁见状,害怕伤到余谊密父子,只得放行。

4名红军战士押着余谊密父子出庄后,王庄敌人200余人全部出动,从后面尾随而来。当敌人大队追到后山附近时,方永乐一声令下,埋伏多时的红八十二师红军指战员立即开火,敌人惊慌失措,乱成一团。战斗不到一小时便胜利结束,红八十二师将敌人全歼。

方永乐(1916-1936),出生于安徽六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3岁时投身革命,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,历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、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少共书记、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等职。

在战斗中,方永乐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。在战斗间隙,他注重战士们的训练和生活,关心士兵的困难和需求,使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,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强大的战斗力,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爱戴,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“小师政委”。

界岭伏击战

王庄战斗的胜利,极大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,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。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出重兵,分多路向红二十八军扑来。

为了彻底粉碎敌人“清剿”,1935年2月16日,红二十八军在潜山县上龙山歼敌一个连后,决定由高敬亭率二四四团第二营和手枪团一分队北上,开赴赤城、赤南根据地打击敌人;方永乐率第二四四团第一营、第三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,转战太湖、霍山、潜山一带,开展游击斗争。

3月29日,方永乐率部进至

霍山、潜山之间的小界岭,国民党第十一路军的一个团就闻讯追了上来。据侦察员报告,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个营为了立功,一路尾随红军狂奔,已经和后面的大队拉开了距离。方永乐经过分析,决定部队停止前进,趁敌麻痹大意、毫无准备之际,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就地埋伏,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。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,方永乐带领战士们迅速占领了界岭地区的制高点,隐蔽在山间茂密的松林里,在大柳树旁架起两挺机枪,等候敌人的到来。

桃树岭诱敌深入

险、地势狭窄的桃岭正适合我军伏击,而装备精良的敌军在此却难以施展,无用武之地。方永乐与军政委高敬亭研究后,决定打一个伏击战,并亲自指挥,将红军主力埋伏两翼,“张网以待”,然后派出小股战士,在和敌人稍作接触后即行撤退,逐步将敌人引入包围圈。

在红军的“频频示弱”下,敌先头部队果然中计,不待后援到达,就急功冒进,很快进入红军的包围圈。当红军发起进攻时,骄横无比的敌人还以为红军实力不过如此,竟组织兵力向两

斛山铺四面合围

命令战士们选择较为坚硬的岩石布置了阵地,因此敌人的炮火虽然猛烈,但未给红军造成大的伤害。不久,敌军从斛山铺的围寨里出动,向红军的正面阵地扑来。敌人见正面阵地红军的火力不强,加快了冲锋的步伐。由于地形狭窄,敌人只能排成两路纵队,向红军阵地进犯。激战多时,敌人“突破”了红军的几处前沿工事。但随着敌人部队不断推移,处于后方的敌人火炮误伤自己人,只得停止了射击。

就在敌人主力接近红军正面主阵地时,方永乐立即命令号员吹号。号声过后,敌人的两翼和背

翼山上红军阵地反扑。方永乐见状,立即命令重武器停止射击。敌人见红军阵地上的火力突然减弱,还以为是红军的子弹打光了,于是更加卖力地向山上冲来。很快,大部分敌人冲上半山腰,完全暴露 in 红军的火力之下。见时机成熟,方永乐立即命令开火,霎时间,敌人被打得尸横遍地。残敌不敢顽抗,纷纷向山下逃去。方永乐立即率主力杀出,冲入敌阵。经过短兵交锋,红军全歼敌人一个团,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支,子弹5000发。

后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敌人猝不及防,被毙伤数十人。敌团长慌忙命令部下后撤,但却遭到了来自自己方炮兵阵地的打击——原来,方永乐事先埋伏的一支部队,乘敌人慌乱之际,一举攻破了敌人的炮兵阵地,并指挥敌人的炮兵向逃回的敌人开炮。方永乐见敌人阵形大乱,随即率领正面阵地的战士冲出战壕,展开追击。在红军的四面合围下,敌人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,很快被分割成数段。经两小时激战,红二十八军歼敌1100余人,缴获各类步枪500余支、轻机枪18挺、大炮2门、子弹10万多发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中央苏区时期 如何提升党支部战斗力

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。中央苏区时期,我们党非常重视支部建设,在党的各级组织、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的连队中均建立了党支部,并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党支部建设,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、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,有力推动了各项革命事业顺利开展。

注重思想建党。当时,为了迅速壮大革命队伍,我们党大量吸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人入党,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一度蔓延。因此,对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思想建设就成为十分紧要的问题。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,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“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,科学化”,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。具体实践中,主要通过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来加强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工作。1933年春起,中央苏区陆续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、苏维埃大学、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。其中,1933年3月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校是中央党校的前身。该校分设三个班: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,党团、苏维埃、工会干部训练班,高级干部训练班。学习科目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党的建设、苏维埃建设、中共党史、历史、地理等。同时,还举办各类训练班,如支部流动训练班、新党员训练班等。这些班次对培训的内容和时长作了明确的安排。以“支部流动训练班”为例,这个班培训对象为支部工作骨干,要求每星期授课2次至3次,每次2小时,授课内容包括“党员须知”“支部工作”“查田运动”“党与苏维埃”等。绝大多数支部工作骨干接受培养训练后,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。为配合教学,在印刷出版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还顺利出版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,组织力量编写了《中国革命问题》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常识读本,供学员当教材使用。在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同时,通过严格规定入党程序,对新吸收的党员设置入党考察期,举行入党仪式,帮助他们认识党的性质和宗旨,有效提升思想觉悟。

完善制度建设。针对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党内生活存在的一些问题,1931年11月,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起草的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》指出:“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,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。”如何实现“彻底的转变”?党的力量来自组织,要转变还得从组织建设发力,从完善制度入手,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。截至1932年,江西省14个县1089个乡,共设立998个党支部,形成了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、以村为单位建立党小组的组织形式,在中央苏区广泛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。在基层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同时,我们党注重通过健全制度抓好支部干事会班子建设,使党支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。支部干事会实行个人负责制,让每个干事专注于一份具体工作;人数较多的支部,可增加干事会人数,并明确好分工。从1932年起,每年在全苏区范围内进行一次“支部改造运动”,发动全体党员对支部领导成员进行民主评议,在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改造,清除那些不称职的支部领导成员,选举那些觉悟高、工作积极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。这一制度安排,有效提高了支部班子领导能力。为了使支部生活能正常开展,各级党组织还建立健全了党支部其他各种制度。其中,“会议制度”规定支部委员会每7天召开一次,小组会每5天召开一次,支部党员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,红军中支部会议的时间和次数,根据战斗的环境来转变;“党费收缴制度”规定党员每月交党费铜圆5枚,连续3个月无故不缴者按自动脱党处理,所收党费一部分留给区委使用,20%留给县委,40%上交苏区中央局组织部;“工作报告制度”规定支部要定期向区委、县委报告工作。这些制度的建立,有利于支部工作的制度化 and 规范化,使基层党支部工作有章可循、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建设模范支部。1928年,党的六大提出“须有模范支部的建立,以创造党的支部生活”。中央苏区积极贯彻,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,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很注重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的工作,注意抓好典型,以点带面。1932年夏,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提出:每个区都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。根据这个要求,各地陆续确定和建立了一批以兴国县长冈乡支部、高兴区黄群乡支部,胜利县平安乡支部、梅窖区三僚支部,长汀县松林、杨背、涂坊支部,红军十三团九连支部等为代表的模范支部,并对模范支部给予表彰并推广经验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扬:“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,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。”1933年,在中共中央机关报《斗争》第5期刊发的《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》中,介绍和推广了兴国县黄群乡模范支部的事迹和经验,“每次会议能按时到,有十分之九能发言。支部和干事会能讨论到苏维埃赤卫军等工作,如乡代表会议制度,紧急集合等,在每次支部会前,能有充分的计划和讨论”。除了宣传推广模范支部的经验,每个区委和支委还从模范支部征调干部,组织突击队去加强 and 突击落后支部的工作。以开展模范支部建设带动一般 and 后进支部的工作,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,如扩红运动中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,瑞金县黄柏区的大柏地支部整个支部加入红军,保证了扩大红军、经济动员等任务的完成,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。(据《学习时报》)

—— 文人轶事 ——

老辈文人令人感动的细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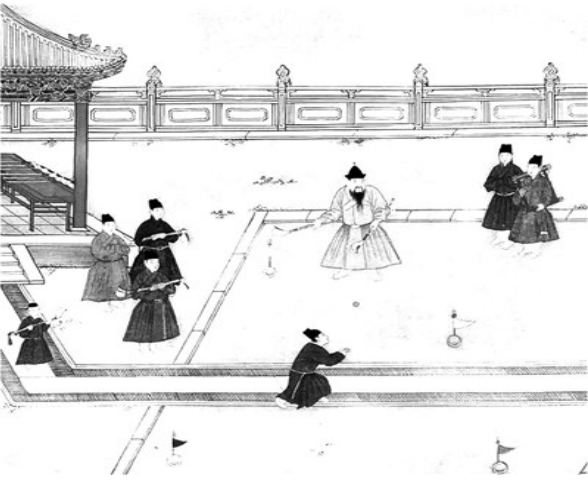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冯骥才先生曾经与多位老作家有过交往,因此,他曾在书中记述过一些老作家们令人感动的细节,让我们看到了老作家们的高尚品格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小说《义和拳》即将出版,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部书很重视,决定请茅盾先生用他擅长的瘦金体为这部书题写书名。茅盾是文学大师,而那时的冯骥才和李定兴,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。茅老会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吗?大家心里都画上了一个问号。但茅盾先生却爽快地答应了,并认真地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。冯骥才回忆说:“记得韦君宜(总编辑)给我看茅盾题写的书名时,在那一页不大的纸上,竟写了几十条‘义和拳’。韦君宜告诉我茅盾先生说怕题不好,多写几条由我们挑。这叫我很感动,并一下触到了这位大家的品格。”

冯骥才在书中还记述了一件事,是关于巴金先生的: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的时候,有一位叫包柏瀚的美籍华人作家也随同访华,包柏瀚很崇拜巴金先生,就提出想去拜望巴金。冯骥才便带着包柏瀚去了巴金所住的旅馆。那天,包柏瀚带了一本英文版的《家》,请巴金先生签了名。可是那天晚上,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打电话找冯骥才,说巴老在冯骥才和包柏瀚离开后,看到包柏瀚的名片,发现自己签名时把人家的名字写错了,将“瀚”字写成了“特”字,觉得这样对人很不尊重,便让冯骥才把书带过去,巴老要重新改正。冯骥才说:“没关系,人家已写错至极,笔误的事常有,不会当回事的。”李小林说:“不行,我爸说订名家名字是不尊重人,一定要改。”冯骥才只好跑到包柏瀚的住处取了书,拿到巴老住的酒店,改好后再送还给了包柏瀚。冯骥才回忆道:“我现在还记得包柏瀚收到书感动的样子。”并且感叹:“这件事叫我领略到他人 in 巴老心中的位置,还有他如何处事待人。”

在细微处能时时为他人着想、在细微处不忘记尊重他人,这正是老辈文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(据《联谊报》)

唐朝的“曲棍球”原来是这个玩法



《明宣宗行乐图》(局部)

现代曲棍球运动起源于19世纪初的英国,并于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。其实,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,就已经出现了“曲棍球”比赛,唐代人称之为“步打球”。步打球是一种徒步持杖击球的游戏,是唐代出现的打马球新玩法。比较起来,步打球没有马球和驴鞠那样奔腾热烈的场面,但自有它的优点和乐趣。首先,不用驴马代步,游戏者奔跑起来更加灵活,击球的准确性提高了,游戏的成就感也提高了。其次,跑步毕竟要比骑马、骑驴安全很多,极少有人会因为玩步打球而受

伤或丢掉性命。再次,活动的空间更加随意。只要有一块空旷的平地,只要大家手里有一根球杖,随时都可以进行。对于古代贫苦的老百姓来说,用马、驴来游戏毕竟是奢侈的。步打球不需要专门的球场,在街道巷口也可以即兴玩起。唐代首都长安的主要街道非常宽敞,一般都有50米至100米,最宽的朱雀大街竟然有150米,在大街上玩步打球是绰绰有余的。

步打球因其危险小、难度小,深受广大妇女和儿童的欢迎。元稹《六年春遣怀八首》:“童稚痴狂撩乱走,绣球花簇满堂前”描写了儿童热热闹闹玩步打球的情景。步打球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了日本。现存日本古都奈良正仓院的一条隋唐时期的花毡上,就织有一儿童在玩步打球的形象:击球的童子右手拿着一个弯月形球杖,正在弓身屈腿作击球状,在其左方绘有一球。整个图案生动地表现了唐代童子击球的生动场景。

步打球在宫廷里也颇受欢迎。唐僖宗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,他对各种打球方式都精通,尤其擅长步打球,他曾对

手下人说:“如果我要考步打球的进士,肯定能拿到状元。”唐朝诗人王建所作的一首宫词这样描写皇宫中的步打球:“殿前铺设两边楼,寒食宫人步打球。一半走来争跪拜,上棚先谢得头筹。”王建的这首宫词,是描写当时的宫人于寒食节这天,到宫殿前表演步打球给皇帝看。当时的步打球是两队竞赛的,每队人数相等,所以称“一半”。胜第一个球的一队要走到皇帝面前去跪拜,然后继续竞赛。最后谁进球多,谁就获胜,胜者有奖。

除了步打球,唐人也发明了肩舆打球。肩舆就是轿子,打球者坐在轿子里,由十几人用肩抬着东奔西走,挥舞球杖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有个地方官员被派到南方上任,苦于南方的马体型矮小不善于打球,就想到了让人抬着他打球的办法。这种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快乐,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严厉批评。

到了宋朝,不再像玩步打球那样十几个人争抢一个小球,而是各人击打各自的球,取消了球门,改用球洞,球进洞得一分。竞赛形式变了,名称也随之改变了,叫“捶丸”。“捶”即击,“丸”即球。

捶丸运动的器具、球场、规则与现代高尔夫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,难怪不少学者称它为“中国高尔夫”。捶丸的球洞叫做“窝”,通常一块比赛场地上